

从“科普”到“科文”

——商务印书馆 50 年来的科学传播

潘涛

(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, 上海 200235)

[摘要] 本文回顾了商务印书馆 50 余年来秉承翻译出版科学文化类的基本学术图书的传统, 出版科学文化作品的历程。

[关键词] 科学普及 科学传播 科学文化出版

[中图分类号] G206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673-8357 (2008) 04-0027-4

From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o Science Culture: An Review of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the Past 50 Years

Pan Tao

(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, Shanghai 200235)

Abstract: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mmercial Press's history of translating foreign science culture books into Chinese.

Keywords: science popularization; science communication; science culture publishing

CLC Numbers: G206

Document Code: A

Article ID: 1673-8357 (2008) 04-0027-4

0 引言

但如果要想了解科学自身更深的意义, 及其与人类思想及活动的其他学科的关系, 人们对科学发展的历史, 就必须有所了解^[1]。

——丹皮尔

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, 有一个奇特的“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”现象——“商务”现象。它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建树, 后世的文化人、出版人, 只能仰之弥高、叹为观止^{[2],[3],[4],[5]}。陈原指出: “出版物——我在这里特别指图书——是文化和文明的集中表现。一个时代的文化, 一个社会的文明, 在很大程度上蕴藏在图书里, 当然, 它——文化和文明——最初表现在图书里, 然后传播到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一切角落;

尔后蕴藏起来——这时叫做文化积累。图书, 在任何情况下, 都是传播文化和积累文化的最有效的工具”^[6]。

1997 年, 商务印书馆百年庆时, 笔者曾经“从《科学大纲》谈起”, 着重探讨商务的科学普及类出版物^[7]。汉译《科学大纲》于 1923~1924 年由一批中国科学社骨干社员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联袂推出, 成为中国科学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^[8]。如今滥觞于学术界的科学传播概念, 其实, 早在 80 多年前即有类似的提法——科学传布。王云五在汉译《科学大纲》“序”里指出: “夫传布科学, 似易而实难。一, 传布者非自身亦为创造之科学家, 则不足以既其深。二, 传布者非淹贯众科之科学家, 则不足以既其广。二者俱矣, 而无善譬曲喻引人入胜

收稿日期: 2008-04-26

作者简介: 潘涛,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; Email: pantao2007@gmail.com

之文字,仍未足尽传布之能事。”此言可谓深得“科学传布”之三昧^[9]。任鸿隽在“介绍《科学大纲》”一文里言:“然则此书所贵者,不在其包罗万有,可以束之高阁,备吾人须要时之顾问,而在其传述科学之方法,能使坚冷无生气之智识对于吾人举生趣味,读者不但了然于科学之进步,且将奋起其自行研究之心焉,此真介绍科学者所馨香祷祝者也。……商务印书馆能博求国内专家担任译事,该全书三十八篇而分任译事者,不下二十人。视东邻日本以二人之力遍译各篇者,其优劣当有间矣。又其图画明显,印刷精良,在吾国出版界中亦无出其右者。吾人既为该馆之成功贺,且幸吾海内智识界疗饥之有物也……”^[10]

徐式谷、陈应年从翻译史的角度,综述了商务印书馆对中国近现代——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——科技翻译事业的巨大贡献^[11]。李亚舒、黎难秋主编的专著《中国科学翻译史》系统梳理了中国科学翻译的流变^[12]。李大光从科普史的角度,阐述了中国科学文化翻译书籍的翻译历史^[13]。本文将散见于科学思想史、科学史、科学哲学、科学社会学、科学家传记、科学家文集、科学家日记等类别的出版物,在宽泛的意义上统称为科学文化类图书。由是视角观之,以出版物为载体,商务印书馆近50余年在传播科学文化方面的贡献甚巨,历史上许多重要的科学名著的中文译本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^[14]。

1 商务印书馆创立头50年的科学文化出版

略微回顾商务印书馆创立的头50年。早在1905年,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严复译的《天演论》,开现代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文化之先河。1915年,发行中国科学社创办的《科学》杂志。1923年,印行《科学大纲》,出版文元模译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》。1929年,编印《万有文库》第一集;1934年,编印《万有文库》第二集。1931年、1935年,先后出版罗素著《原子说发凡》、《科学之将来》、《科学观》,1937年,出版拉马克著《动物哲学》。1944年,印行《法拉第传》。

2 商务印书馆50年代后的科学文化出版

2.1 科学文化出版物年表

1950年代以来的近50年,除了“大革文化命”的10年间,商务印书馆继续在科学文化出版领域保持领先地位。以下逐年选取若干代表性的图书为例。

1949年11月,出版爱因斯坦著《物理学的进化》、郭沫若译《生命之科学》第三册。

1950年,出版《居里夫人传》、《物理学史》、《原子能与宇宙及人生》,纽康著、金克木译《通俗天文学》。1951年,出版《进化——从星云到人类》。1955年,重印黄素封译《达尔文日记》。1956年,出版戴维著、黄维荣译《心血运动论》。1957年,出版牛顿著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》、达尔文著《人类原始及类择》、彭加勒著《科学与假设》。1958年,出版柏格森著《时间与自由意志》。1959年,出版普朗克著《从近代物理学来看宇宙》、怀特海著《科学与近代世界》、培根著《新大西岛》。

1963年,出版周建人等译的达尔文《物种起源》(第一、二、三分册)、叶笃庄等译《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》、里沃夫著《爱因斯坦传》。1964年,出版秦斯著《物理学与哲学》、波尔著《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》、玻恩著《我这一代的物理学》和《量子理论》。1965年,出版薛定谔著《关于波动力学的四次演讲》、诺意曼著《计算机和人脑》、赖欣巴哈著《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》。1966年,出版《坂田昌一物理学方法论文集》、赖欣巴哈著《科学哲学的兴起》。

1974年,出版海森堡著《物理学与哲学:现代科学中的革命》(内部发行)。1975年,出版丹皮尔著《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》。1976年,出版许良英等编译《爱因斯坦文集》第一卷。1977年,出版范岱年等编译《爱因斯坦文集》第二卷。1978年,出版劳厄著《物理学史》、维纳著《人有人的用处》。1979年,出版《爱因斯坦文集》第三卷、朱克曼著《科学界的精英》、柏廷顿著《化学简史》、玻恩著《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》。

1980年,出版《近代地理学创建人》。1981

年,出版斯科特著《数学史》、海森伯著《物理学和哲学》、伽莫夫著《物理学发展史》、皮亚杰著《发生认识论原理》、波林著《实验心理学史》、达尔玛著《伽罗瓦传》。1982年,出版亚里士多德著《物理学》、博姆著《量子理论》、莱斯特著《化学的历史背景》、坎农著《躯体的智慧》、贝尔纳著《科学的社会功能》、罗素著《数理哲学导论》《宗教与科学》、达尔文著《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》、毕黎译《达尔文回忆录》。1983年,出版达尔文著、潘光旦等译《人类的由来》(上、下册),罗素著《人类的知识》。1984年,出版《居里夫人传》(修订第5版)、弗洛伊德《精神分析引论》。1985年,出版沃尔夫著《十六、十七世纪科学、技术和哲学史》、丹齐克著《数:科学的语言》。1986年,出版柏拉图著《理想国》、马赫著《感觉的分析》、魏尔著《对称》、马吉编《物理学原著选读》、《世界医学史》、《尼耳斯·玻尔集》。1987年,出版萨顿著《科学的生命》。1988年,出版《爱因斯坦传:生·死·不朽》。

1990年,出版海森伯著《物理学家的自然观》。1991年,出版沃尔夫著《十八世纪科学、技术和哲学史》、贝尔著《数学精英》、席艾玛著《现代宇宙学》、克洛德·贝尔纳著《实验医学研究导论》、《气候与生命》。1992年,出版“世界名人传记丛书”《达尔文回忆录》、《爱因斯坦传》、《居里夫人传》。1994年,出版“商务新知译丛”《科学与人》、《爱因斯坦与相对论》、《QED:光和物质的奇异性》、《观海窥天》。1995年,出版《化学史传》、《西方名著入门·自然科学》、《西方名著入门·数学》。1996年,出版沃克迈斯特《科学的哲学》、彭加勒《最后的沉思》、侯世达《哥德尔、艾舍尔、巴赫》^[15]。1997年,出版《爱迪生传》、《费米传》、魏格纳著《陆地和海洋的起源》。1998年,出版《湍流:浑沌理论与整体性科学导引》(刘华杰、潘涛译)。1999年,出版戈革译《尼耳斯·玻尔哲学文选》、贝塔朗菲著《生命问题》、科恩著《科学中的革命》。

2000年,出版默顿著《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、技术与社会》、《巴斯德传》、笛卡尔著《谈谈方法》。2001年,出版《伽利略传》。2002年,出版阿盖西著《法拉第传》、卡西第著《海森伯传》。2003年,出版默顿著《科学社会学》(上、下册)、齐曼著《可靠的知识》。2004年,出版默顿著《科学社会学散忆》、布什等著《科学——没有止境的前沿》、派斯著《爱因斯坦传》。2005年,出版迪昂著、孙小礼等译《物理理论的目的和结构》^①。2007年,出版马尔凯著《词语与世界》。

2.2 科学文化出版物中的4个案例

丹皮尔《科学史》于1929年初版,1949年第4次修订本是经作者修订后的最后版本,至1958年已经印行21版。它的最早中译本,系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,任鸿隽、李珩、吴学周译的《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》(上、下册),列入“大学丛书”。1947年列入“新中学文库”重印。任鸿隽1946年3月在“中译本序”里,开篇即指出:“我国的出版界到现在为止,还缺乏一部好的科学史,这是多年以来我们所感到的一种需要,一种要求。”1975年9月,商务又出版李珩据第4次修订本重译的《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》。1989年列入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重印。江晓原曾经撰文回忆读这部《科学史》以及与译者李珩的“弥觉亲切”、“如沐春风”般的交往^[16]。

牛顿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》于1687年以拉丁文出版。1928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了《原理》第一个中译本,由郑太朴据德文版转译。1931年,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》分订10册收入《万有文库》第1集,后于1957年重印^[17]。2006年,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赵振江据1726年拉丁文第3版直接移译、参考英文译本、德文译本的新的中文译本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。

达尔文《物种起源》于1859年出版。1918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了《起源》第一个中译本《达尔文物种原始》,由马君武用文言文译成。当时

① 斯斯续续翻译达37年之久。

的文化界、教育界隆重集会,庆祝该书的译就。关于此书,另有一说是 1920 年译出^[10]。1930 年,以《人类原始及类群》分订 9 册收入《万有文库》第 1 集。1995 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《物种起源》修订本。

80 余年来,商务印书馆始终坚持用出版的形式传播爱因斯坦的思想。1922 年,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爱因斯坦的中国学生夏元琛翻译的《相对论浅释》^[11]。为配合拟议中的爱因斯坦来华,商务印书馆《东方杂志》第 19 卷第 24 期专门出版了《爱因斯坦号》。1923 年,商务印书馆及时出版了石原纯著、周昌寿译《爱因斯坦和相对性原理》。1924 年,出版张君勱《伦理学上之研究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》、周昌寿《相对性原理》。1925 年,出版爱因斯坦著、文元模译《相对原理及其推论》。1939 年,出版周昌寿《相对性之由来及其概念》^①。直至 1976 年,出版许良英等编译的《爱因斯坦文集》第一卷。2007 年 12 月,《科学文化评论》发表许良英的文章《一部多灾多难书稿的坎坷传奇历程——〈爱因斯坦文集〉再版校订后记》^[20]。

3 结语

50 余年来,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学术出版机构,商务印书馆历经“文革”十年浩劫,历经几代领导人的更迭,始终没有放弃翻译出版科学文化类的基本学术图书的传统,堪称“科学传布”的出版重镇。无论从狭义的科普史、翻译史,还是广义的科学传播史、中外文化交流史来看,科学文化历来是其中的重要内容。科学思想、科学精神的传播普及,自近代科学兴起,一直是科学人代代相继的事业,而出版人在这项事业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

参考文献

[1] W.C.丹皮尔.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[M].李珩

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4: 635.

[2] 王建辉.文化的商务:王云五专题研究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0.

[3] [法]戴仁.上海商务印书馆:1897—1949[M].李桐实译.上海:上海商务印书馆,2000.

[4] 杨扬.商务印书馆:民间出版业的兴衰[M].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0.

[5] 李家驹.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5.

[6] 陈原.总编辑断想[M].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1: 16.

[7] 潘涛.商务印书馆:引进现代科学的桥梁——从《科学大纲》谈起.商务印书馆一百年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8: 314—323.

[8] 潘涛.汉译《科学大纲》:20 年代一大出版盛事[J].科学,1997(1): 45—47.

[9] 樊洪业.科学旧踪[M].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2000: 98

[10] 任鸿隽.科学救国之梦[M].上海: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,2002: 293—294.

[11] 徐式谷,陈应年.商务印书馆对中国科技翻译出版事业的贡献[J].中国科技翻译,1998 (1): 46—50.

[12] 李亚舒,黎难秋.中国科学翻译史[M].长沙:湖南教育出版社,2000: 666—669.

[13] 李大光.翻译:沟通中西科学文化的恒久渠道[J].科普研究,2008 (1): 60—66.

[14] 杨舰,戴吾三.历史上的科学名著[M].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3.

[15] 商务印书馆 110 年大事记编写组.商务印书馆 110 年大事记(1897—2007) 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7.

[16] 江晓原.几种商务版科学史经典的回忆[J].编辑学刊,2008(1): 46—47.

[17] 戴念祖,周嘉华.《原理》——时代的巨著[M].重庆: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,1988.

[18] 邹振环.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[M].北京: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1996: 274—275.

[19] 邹振环.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[M].南宁:广西教育出版社,2000: 136—137.

[20] 许良英.一部多灾多难书稿的坎坷传奇历程——《爱因斯坦文集》再版校订后记[J].科学文化评论.2007(6): 62—70.

① 在胡大年著《爱因斯坦在中国》(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,2006)附录二“1917—1949 年出版的关于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中文文献”中,未列周昌寿的这本书。另见:戴念祖,中国人何欢迎相对论——评胡大年《爱因斯坦在中国》一书,物理,2007 年第 3 期;戴念祖,爱因斯坦在中国——记 1922 到 1923 年间爱因斯坦两次路过上海和相对论在中国早期的传播,载:赵中立、许良英主编《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》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79 年。